

经济学的 边际革命

说明和评价

R.D.C.布莱克 A.W.科茨 编
克劳弗德·D. W. 古德温

商 务 印 书 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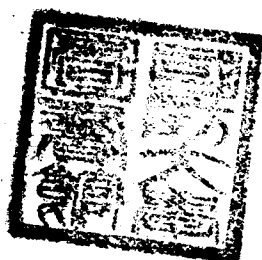


经济学的边际革命

说明和评价

R. D. C. 布莱克 A. W. 科茨 编
克劳弗德·D. W. 古德温

于树生译



商务印书馆

1987年·北京

Edited by
R. D. Collison Black
A. W. Coats
Craufurd D. W. Goodwin
THE MARGINAL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North Carolina. 1973
本书根据杜克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译出

JINGJIXUE DE BIANJI GEMING

经济学的边际革命

说明和评价

R. D. C. 布莱克 A. W. 科茨 编
克劳福德·D. W. 古德温

于 耕 生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4017·340

1987年4月第1版 开本850×11681/32
198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290千
印数3,300册 印张12 1/8
定价: 2.30元

出版说明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差不多同时但却是各自完全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一原理后来被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所接受,对一个多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边际效用价值论,以及十九世纪末明确提出的边际生产力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宏观经济学进行总量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在宏观经济学中使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在宏观经济学中也被广泛地采用。因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这一原理的发现称为“边际革命”。为了纪念“边际革命”一百周年,1971年8月22日至28日,西方经济学界在意大利的贝拉焦就“边际革命”问题举行了讨论会。本书就是这次会议的论文汇编,是西方经济学说史方面的一部专题论文集。

全书共收论文十八篇,内容丰富,既有“边际革命”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衰落,也有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的兴起,尤其是对边际主义的起源问题作了比较周密的探讨。在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中,分析了边际主义所由发生的内在的思想条件和各种环境因素对经济学家的影响。这些环境因素包括经济发展阶段、文化水平和社会结构,以及直接影响经济学家的舆论、讲学机会、研究机会、科学家之间的通讯渠道,等等。为了说明边际主义的起源,一些论文引用了有关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的不少传记资料。本书还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边际主义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传播问题,不仅涉及一些国家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及因时而异的通

讯渠道对边际主义传播的影响，而且分析了有关边际主义的各种概念的定义、这些概念在传播中所经历的重要修改和重新解释、这些概念被接受的程度（被什么样的人接受、接受的速度和质量），以及吸收边际主义时所受到的舆论、一般文化修养和在这门学科中知识状况的影响。

对“边际主义”问题应当怎样看待？我们认为，首先，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一种以主观心理分析方法来说明价值形成过程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一个多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都用它来反对、诋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而攻击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在本书所收的《边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边际主义在日本》等论文中，都有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这种诋毁。对此，我们必须据理给予批驳。但这也并不等于说边际效用概念本身无可取之处。其次，边际生产力论作为一种分配理论是错误的，它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但作为一种生产的理论则有参考价值，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不同生产要素及其投入量的变化对产出量的影响。再次，边际分析作为一种纯数学分析方法是有益的，但必须在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有关“边际主义”的问题，诸如“边际革命”的来龙去脉和“边际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的传播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本书为了解和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书中论述的问题除某些特定课题外，也涉及经济学史上有关方法和目的的若干问题，例如传记资料对研究经济学史的作用问题等等，而对于这类问题，本书编者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并予以反映。这种情况，对我国读者开拓思路，深入探讨“边际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也会有所助益。因此，我们将本书组译出版，供读者参考。

目 录

序言.....	(1)
有没有边际革命?	马克·布劳格 (3)
边际主义的起源.....	理查德·S.豪伊 (16)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边际革命的经济的和社 会的来龙去脉.....	A.W.科茨 (41)
边际主义和经济科学的界限.....	唐纳德·温奇 (63)
穆勒和凯尔恩斯与边际主义在英国的出现	N.B.德·马希 (83)
W.S.杰文斯和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R.D.科利森·布莱克 (104)
莱昂·瓦尔拉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 革命”中的作用.....	威廉·雅费 (120)
维尔弗雷多·帕雷托与边际主义.....	文森特·J.塔拉西奥 (145)
奥地利学派在多大程度上是边际主 义者?	埃里希·施特赖斯勒 (166)
“边际革命”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衰落	T.W.哈奇森 (183)
边际革命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约瑟夫·J.斯彭格勒 (211)
边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罗纳德·L.米克 (242)
边际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 1871—1890	皮耶罗·巴鲁奇 (256)

边际主义在日本.....	松浦保 (278)
边际主义走向新世界	克劳弗德·D.W.古德温 (296)
边际效用论的采用.....	乔治·J.施蒂格勒 (317)
边际主义：收获	G.L.S.沙克尔 (334)
回顾与展望	A.W.科茨 (350)
译名对照表.....	(372)

序 言

经济分析的主要“正统派”传统的值得注意的连续性（从亚当·斯密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来），常常被引以为例，证明认为经济学是一种科学——它实际上是所有社会科学中最科学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然而，在过去十年中很多人认为科学史的特征是有一些周期性的间断、“危机”或者“革命”，因此，应当重新考虑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能否放进这个范畴的问题。人们熟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几个不同国家中有少数高明的革新者发表了一系列的创见，这些新概念，总的来说，对下一个世纪中经济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件事真是经济学发展中表面上连续性的一个例外吗？那些最早的边际主义者目的一致以及成绩相似的程度，可以使我们有理由把他们放在一类吗？当他们的作品和前辈及后辈的著作相比时，他们的贡献新颖和重要的程度足以使他们对于通常加在他们身上的光荣称号受之无愧吗？简言之，实际上有一个边际革命吗？如果有的话，值得纪念吗？

我们组织这次讨论会，就是希望弄清楚这些问题和有关的一切。本书里发表的论文以各种不同观点仔细考查边际革命，即根据他们的前辈的话、这些革命者自己的话、他们的信徒和后代所传播的思想，以及这一切的总的影响来考查。纲目的选择以及所包括的范围必然是不完全的，部分地是由于一些预料不到的情况和无法避免的逻辑的障碍，但部分地也是因为这个领域里已经有了大量文献，例如，论述第二代边际主义者的文献。

本卷中的文章以那些为了1971年8月22日至28日在意大利贝

拉焦的塞尔贝洛尼别墅举行的一系列会议而准备和讨论的论文为根据。会议参加者愿意对洛克菲勒基金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所提供的直接支持和殷勤招待,表示由衷的谢意。在五天热烈的、连续的和激励人心的讨论中,出现了许多有意义的意见分歧和解释,所涉及的范围既有那些正在研究的特定课题,也有经济学史上许多比较广泛的关于方法和目的的问题。这些问题之中,有些由布劳格先生和科茨先生分别在开头的和结束的两篇文章中加以研究。其他的问题也在全书中一再提起。虽然有些论文因为配合会议在贝拉焦的活动而作了修改,但作者和编辑都没有蓄意在有争论的问题上强求一致。实际上,在某些地方,为了对读者有益还强调了意见的分歧。

最后,应该指出,讨论会参加者离开贝拉焦时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无疑这是受了那种幽美的和使人高兴的环境的影响——觉得经济学史是一个内容丰富、学者们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这里有那么多尚未得出答案的问题、尚未试过的研究方法,以及尚待选择的探究机会。因此这本论文汇编应该被认为是对将来工作的一个临时的备忘录,而不是关于边际革命的最终论断。

R. D. C. 布莱克

A. W. 科茨

C. D. W. 古德温

有没有边际革命？

马克·布劳格^①

—

“边际革命”一词通常被认为是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差不多同时但却各人完全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作为一种新的静态微观经济学的基石。他们的论点是，这个原理成为经济思想史上多次发现的最好的例证之一，完全需要某种根据历史的解释：很难相信，三个人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在曼彻斯特、维也纳和洛桑那样大不相同的文化气候中从事研究，竟会偶然想到同样的概念，这一定是由于某种共同的原因，怎样找出这种原因是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唯一的困难是所有的标准解释中没有一种是令人信服的。^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奥地利和法国经济发展的水平那样不同，以致根据生产结构的变化或者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各种隐蔽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都使我们难于轻信。同样地，英国哲学的功利主义一经验主义传统、奥国的新康德哲学的气候和法国的笛卡尔哲学的气候，根本没有共同的成分可以引起经济学上一场效用革命。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实际上和古典派思想有连续性，并且，当杰文斯和瓦尔拉论述政策问题时，实际的主张和他们价值学说的观点之间只有很少的关系或者完全没有关系。至于所谓“需要”保卫资本

^① 马克·布劳格 (Mark Blaug)，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教育经济学教授。

^② 我的《经济理论的回顾》第二版 (霍姆伍德，伊利诺斯州，1968年) 第 303—308 页，讨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这里的注是想要重新考虑那几页中提出的问题。

主义制度，简直没有比古典经济学的旧的工资—人口结构或者巴斯夏的著作更合适的东西，而这些和边际效用完全没有渊源。最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英国或在欧洲大陆没有真正的关于知识危机的感觉，那可能曾促使人们寻求可供选择的经济模式；此外，历史循环论是这样的一种可供选择的经济模式，1860年以后，它继续获得信徒，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也是如此。总之，边际效用的同时发现可能需要一种解释，但已有的解释中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

或许困难在于“边际革命”的概念，象“重商主义”的概念或者凯恩斯所解释的“古典经济学”的概念那样，是经济思想史的那种“理性的改造”，那一定会产生使人迷惑的历史难题。我想，这是问题的主要部分，但不是全部。关于所谓边际革命的辩论，实际上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对这种革命（如果它是革命的话）的起源的说明和对它的最后胜利的说明。学术史上使用“说明”这个概念时一定程度的粗心大意，更把这种辩论弄得模糊不清。

二

一种有益的开始的方法是问我们自己，按罗伯特·默顿对这个词的理解，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之发现边际效用，实际上是不是一种“重复”^①。在深入研究科学史上数以百计的重复发现以后，默顿下结论说：“所有的科学发现在原则上都是重复的，包括那些表面上似乎是单独的在内”（第477页）。唯恐这种说法会似乎是一种“自动封闭的假设，不容许调查研究”，默顿承认只有某些科学在它们发展的某些阶段时确实是如此，“很多的各种证据……因此可以表明，科学一经制度化，有许多人从事于科学研究，他

① R.K.默顿的《科学发现中的单独和重复——科学的社会学中的一章》，载《美国哲学学会的会议录》105，第5期（1961年）。

们就会不只一次地单独作出同样的发现，而这些单独的成就可以被想象为受到阻碍的复合成就”(第482页)。虽然他的264项深入研究的复合成就中有三分之二涉及十年或者不到十年的一段时期，默顿却不肯把复合成就的概念局限于差不多同时的发现：“甚至在历法时间上彼此相距很远的一些发现，在社会的和文化的的时间上也可以有意义地认为它们是同时的，这要看各个不同文化中知识积累的情况以及产生这些新发现的各个社会的结构如何”(第486页)。以上所说的已经足以表明“复合的”这个概念是难于解释的，特别是在不象自然科学那样专业化的领域里。然而，这种论点的要旨似乎是“成熟的科学”的特点是累积的、连续不断的进展会使下一步的跃进至少很可以预测，即使不是绝对必然会发生的。^①

现在我们可以问：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经济科学的状况是不是那样，会使得边际效用原理的最后发现成为一种完全可以预测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差不多同时发现这一原理，就不足为奇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一定是“不是那样”。

首先，很有疑问的是，我们是否可以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种经济科学，好象它是一项由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共有的遗产，他们研究同样的论文，阅读同样的刊物，并且在研究分析同样范围的问题中使用同样的一套工具。粗略地看一下哈奇森关于1870年前后英国、德国、奥地利、法国和美国的经济思想状况的扼要叙述，就会看出当时至少有两种（如果不是三种或四种）经济科学的“模式”

^① 默顿为了防止他自己被人误解，否认他的论点意味着“一切新发现都是必然的，就是，不管怎样，这些发现在适当的时间和地方总会有人作出的，即使不是由那些实际上作出了新发现的个人”（第485页）。关于一项类似的保留，参阅他的《对科学中重复发现的系统研究的阻力》一文，载《欧洲社会学期刊》第4卷，第2期（1963年），第248页。

存在。^①虽然杰文斯和穆勒影响的压力作斗争,德国经济学家早已抛弃了“斯密的一套东西”以及从那里衍生的李嘉图的各种论点,法国经济学家却对于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的特征或者德国历史学派嘲讽的呼声都始终没有表示多大兴趣。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止,^②英国经济学的偏狭性以及各国经济学家之间没有交往,完全可以用事实证明;例如,杰文斯是一位主要的经济学藏书家,而他在1882年去世的时候并不知道有一个门格尔已经写了一本经济学的书,有朝一日人们会把这本书和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相比拟。第二,有人认为经济科学本来就必然会在十九世纪中期前后走向发现边际效用,但这种看法只是根据事实加以合理化而已。确实,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古典经济学上可能性更大的下一步是把李嘉图地租论中的边际概念推广到所有的生产要素,就是,发展到一种要素边际生产力的价格论,也许是把李嘉图的价值论进一步精炼成为象线性的投入—产出分析那样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前者迟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我们的边际效用三人小组的下一代中才做到,而后者在二十世纪才出现。

然而,认为边际效用不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新发现,而只是重新被发现这种相反的说法,又怎么样呢?劳埃德和朗菲尔德在1834年曾指出总效用和边际效用之间的区别,不久以后西尼尔又提出同样的看法(我不提起十八世纪的伯努利,因为他“不属于这个范围”以内)。如果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不构成一种“重复”,或许劳埃德、朗菲尔德和西尼尔应该当之无愧。可是劳埃德、朗菲尔德和西尼尔没有真正利用边际效用,这样只是证明怀特黑德的

① 哈奇森:《经济学说评论,1870—1929年》(牛津,1953年),第1、8、12和16章;也参阅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在他们的论文里引述的一些著作家,简直没有一个共同的姓名。豪伊:《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年》,(劳伦斯,堪萨斯州,1960年),第1—5章。

② 参阅哈奇森:《边际革命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衰落》一文,见本书下面。

格言，一切新的东西已经被一个未曾发现这种东西的人说过了。同样的反对理由不适用于杜普伊（1844）、戈森（1854）和詹宁斯（1855年），他们都不仅重新发现边际效用，而且用它来分析消费者行为（并且戈森以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全部信心和革命热情这样做）。不过适用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的同样的论点现在适用于杜普伊、戈森和詹宁斯：他们差不多同时想到边际效用递减律，可是各人所受的理智压力完全不同，并且没有得到一套继承下来的相似的经济概念。

我们现在已经收集到三个“经济学家的三人小组”，共计九个姓名，他们在1834年至1874年间采用了边际效用的概念，其中四人确实把它看作根苗，从这里可以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学。如果我们否认这构成一种默顿式的“重复”，那不是作无谓的挑剔吗？

我们怎样可以避免这种困境，是很清楚的。回忆默顿自己的话：“甚至在历法时间上彼此相距很远的一些发现，在社会的和文化的时间上也可以有意义地认为它们是‘同时的’，这要看各个不同文化中知识积累的情况以及产生这些新发现的各个社会的结构如何。”这样，根据从1834年至1874年这一段时期内边际效用反复地在不同国家被单独地发现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说，当时一定有一种世界各地经济学家共同所有的经济思想的核心，他们的内心的逻辑最后会使他们使用效用理论的工具探究消费者的需求。换句话说，我们能够根据重复发现的存在来推断这门科学的情况，而不是从相反的方向。不过这是使重复论失去它的最引人注意的特色，即一种科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预言的。只要我们认真对待默顿的论点，因为它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附有许多例外的归纳性的概括，我们就必须否认有九个人名就一定构成“重复”。问题很简单：假如科学家们之间的通讯是完善的，所有的重复都会被预先防止，我们就会只看到一些单独的发现；另一方面，假如科学

家们之间没有任何通讯，重复的意义最多只是象闪电有时在同一地方袭击两次；所以，如果从事于一门学科的实际工作者之间有很快的但不完善的通讯，重复只是一些有趣味的现象。

确实，古典经济学没有需求学说，它的关于价格决定的理论迟早总会有人觉得它特别不对称。但是正如库尔诺说明的那样，不引进关于效用的理由也完全可能弥补这一缺点。再则，确实在整个十九世纪，边际效用“很流行”，差不多每十年左右就重新掀起一次高潮：劳埃德和朗菲尔德，1834年；杜普伊，1844年；戈森，1854年；詹宁斯，1855年；杰文斯，1862年（他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理论）；门格尔，1871年；以及瓦尔拉，1874年。但这完全不是说边际效用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可避免的。我们也不妨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宏观经济学的出现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某些瑞典经济学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象罗伯逊和凯恩斯一样，循着同样的路线在思考。“因一事随另一事而起，故后事为前事所造成”，是文化史上一种长期存在的诱惑。

三

豪伊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年》一书告诉我们，“边际革命”和工业革命一样，当时身临其境的人没有认识到。现在的标准说法，认为这场革命的时间在1871年左右，并且把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这三个人名连在一起，因为他们写的书基本上是关于同一问题的。这种标准说法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第一次发表，（尽管马歇尔于1890年表示赞同）直到过了世纪末好久才成为经济思想史的一项固定的特征。^① 边际效用价值论经过长期迟延才被人接受，同时关于这个理论的历史的合理叙述也经过长

^① 豪伊，第28和27章。

期迟延才被人接受,这或许最能说明它确实是一种不正常的产物,不是合乎逻辑地发源于古典经济学。换句话说,这使人想到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是经济学史的那些革命的阶段之一,那时候,用托马斯·库恩的语言来说,经济学家采用了一种新的“范例”来指导他们的工作。

可惜,关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所提出的这个新范例究竟是什么,似乎没有一致的意见。那是一种新的以需求而不是以供给为重点,以消费者的效用而不是以生产成本为重点的范例吗?①那是一种和主观价值论同样有野心的东西,准备取代过去的那种客观的劳动—成本论吗?②那是把最大限度利用的原则从商号扩大到家庭,使消费者(而不是企业家)成为合理行动的集中体现吗?③也许是相等边际的原则,隐藏在边际效用对价格的比例关系中,作为消费者平衡的条件吗?④或者,它是,象熊彼特喜欢说的那样,一般均衡分析的明确的或者含蓄的发现吗?⑤或者最后,它仅仅是第一次有意识的承认必然会追求最大限度的效用,作为一切经济推理的原始模型吗?无论我们采取哪一种说法,都很难支持这个论点,认为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真正心里先有了同样的范例。

不管怎样,门格尔是多余的一个人:他自己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象杰文斯和瓦尔拉那样;他避免用数学公式表示,因此就避免纯粹的极值问题的逻辑;他只是用文字阐述了“戈森的第三定

① 参阅A.W.科茨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边际革命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来龙去脉》一文,见本书下面。

② 参阅R.L.米克的《边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文,见本书下面。

③ 出处同上。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斯密的关于职业选择的理论确实把个别的工人作为最大限度利益取得者。把合理行动的范围扩大到家庭这种观念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是把它扩大到消费者行为的想法是新颖的。

④ 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第301—302页。

⑤ A.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纽约,1954年),第918页。

律”，确实没有加以强调，他确实反对了成本价值论，但是另一方面他深切地怀疑一切明确的决定价格的理论，并且他强调间断性、变化无常，以及围绕着市场价格的讨价还价。^①换句话说，把杰文斯与瓦尔拉两人和戈森放在一起，要比和门格尔放在一起有理由得多，标准说法的唯一理由是门格尔的名字不断地被他的信徒维塞尔和庞巴维克提出来，他们都决心要说服经济学界人士相信奥地利经济学是一种变异的产品。同样，需要事后的认识才能看出杰文斯和瓦尔拉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前者精确地阐述了物物交换的理论，明确地用数学说明了“戈森的第三定律”，提出一项劳动的短期供给计划表的理论，并许了一些有雄心而未能实现的关于一种新的效用经济学的诺言；后者则真正地根据效用表作出了需求曲线，同样努力地根据边际生产力的考虑得出了供给曲线，研究出了一种市场定价的学说，并且把所有的成分在一个总的均衡机构以内交织在一起。

整个问题由于历史使创始者遭受的冷遇而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边际效用”一词中证明是重要的部分“倒是那形容词而不是那名词”。^②效用学说逐渐被弄得失去了它的一切锋芒，结果成为仅仅是“表现出来的喜爱”，成本价值论被证明并不错误，但只是作为一种特殊情况是正确的；一般均衡实际上不见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由希克斯和萨缪尔森使它复生，作为“大众的经济学”。人们在1871年就能预见边际效用经济学通过帕雷托的那种福利经济学发展到成本—利益分析和动态规划所走的曲折道路吗？我们说“边际革命”而不说“边际效用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边际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推理的范例是二十世纪的新发明；在李嘉图

① 关于这个论点的一种有点极端的说法，参阅施特赖斯勒的《奥地利学派在多大程度上是边际主义者？》一文，见本书下面。

② 喻奇森：《经济学说评论》，第18页。